

清末



QINGMO SHEHUIWEIJI YU
ZHENGFU YINGDUI

苏全有 著

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

解读清末社会向民初转
型的根本动因，以为当今乃
至未来社会发展之资鉴

清末

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

QINGMO SHEHUIWEIJI YU
ZHENGFU YINGDUI

苏全有 著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封面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苏全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ISBN 978-7-01-011945-8

I. ①清… II. ①苏… III. ①突发事件-公共管理-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9833 号

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

QINGMO SHEHUIWEIJI YU ZHENGFU YINGDUI

苏全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30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945-8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言

清末处于中国历史剧变的前夕,它是封建王朝的末世,又萌生了共和国的新芽。作为不同于历代王朝更迭的转折时期,清末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引起了后人的高度关注。清王朝崩溃以后,学者们著书立说,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大量研究。不过,学术界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时期的社会震荡,尤其是勃然而兴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苏全有教授《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一书,从新的视角探讨这一历史变局,别开生面,提出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论题。

书中所涉及的时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对清政府而言,则是遭遇空前危机的厄运之秋。自西方列强入侵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历经接连不断的民族灾祸和日趋深刻的社会变动,至清末,各种因素层叠累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在中国历史上,这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时期之一,不仅呈现了末世王朝的种种景象,而且更熔铸了与传统迥异的时代内涵。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社会的危机,“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是“内因决定的认同危机”。在传统社会里,当“组织原则所限定的活动范围内,控制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对系统整合构成威胁,并危及到社会认同本身”之时,便会发生危机。^①众所周知,晚清时期的社会变局和日趋严重的统治危机,并非仅仅源于内部矛盾,除了这一传统特征之外,还与外部的侵扰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外关系的剧变,引起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认同,形成了内外失控的危机局面。而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当面临统治危机之时,必然采取种种措施予以化解。如何应对内外交困的复杂危机,成为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探讨清政府应对危机、稳固统治的举措及其失误,从对立面揭示了武昌起义成功的另一原因,无疑有助于深化对清末政局的认识,为剖析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①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1、35页。



鸦片战争之后屡遭列强打击的清政府,步入20世纪初,已陷入危机重重的困境。民族灾难和国内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产生了一大堆社会问题;而为摆脱危机而实施的新政改革,又转而衍生为新的隐患。如果深入观察,清末政局呈现出危象丛生、因果相循的奇异图景,真可谓危如累卵。例如,军队是国家最重要的机器,清政府建立新军,可说是维护统治最重要的举措。然而,这一举措却为革命派的反清起义开启了方便之门,成了清政府致命的败笔。其他各种革新,如培养新式人才的教育改革,也是种豆得瓜,事与愿违。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曾随侍光绪的清廷史官恽毓鼎反思这一惊天巨变,认为清末新政酿成了“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留学生、新军、资政院及谏议局是“亡国三妖”,而力行新政的张之洞、张百熙则是“罪魁祸首”。^① 革命党人也有类似的感慨,孙中山说张之洞“造成楚才,颠覆满祚”,直截了当地将他誉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②

无疑,清政府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复杂而又深刻,该著从主要方面作了较为充分的揭示。例如,革命派坚持不懈的武装起义,直截了当地否定了它存在的合法性,对其统治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的民众斗争,又呼应革命运动,打乱了统治秩序,使它应接不暇,加剧了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末世乱象。报纸书刊的开放和大量发行,改变了舆论钳制的传统格局,为危机的逐步加深推波助澜,不失时机地给社会的新诉求灌注了思想观念的养分。而清政府赖以控制时局的各种手段,却失去了应有的效果,演变成适得其反的潜在危机。新军的异化和失控,使得控御危机最重要的利器名存实亡。财政上的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使它缺乏化解危机的经济实力。具有政治和伦理色彩的教化亦难以奏效,使它失却了维系人心的重要手段。以上种种,说明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统治的基石不断动摇而趋向瓦解。

在揭示清末危机四伏、乱象丛生的基础上,该著对清政府的应对方策作了较为深入全面的剖析。关于新军失控,作者既分析了清政府本身的原因,同时又注意到非政府的各种因素。前者如人事控制、财政控制、过急心态以及中央

^①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史晓风整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561页。

^② 《孙中山游鄂之续志》,《时报》1912年4月15日。

政府无能、控制较为宽松、旗兵建设相对弱化；后者如新军成分中的会党色彩、军事留学生受到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影响、新军知识化、学生青春期的叛逆倾向等。关于财政危机，作者认为清政府的失策，在于盲目无序、操之过急，在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问题上未能强干弱枝，没有有效地控制支出规模以及对投资新政的必要性宣传不力等。关于舆论失控，作者认为与清政府的政策举措失当有直接的关联。诸如控制趋松、官报不力、报律无效、执法混乱等，以致官报未能起到主流导向的作用，而民办报刊则反客为主，统驭了舆论。此外，外国庇护的海外和租界报刊，清政府是欲禁不能；又随着报界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种有利条件的支撑和推动，报刊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逐渐扩大，舆论愈益成为一种取代“天意”的力量。与此同时，当西学东渐成了一股势不可当的浪潮之后，如何化解或缓释传统的教化危机，清政府亦多有失策。例如，清政府未能充分利用民间资源，以改善舆论氛围；也未采取适当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强化相关机构如存古学堂的建设等，以致在教化方面也毫无成效。

如果说，新军异化、财政拮据、舆论失控和教化无果，是潜藏在清政府体制之中而随时可以触发危机的危险源，那么，彼此呼应的革命派武装起义和民变事件，则对现存的统治秩序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如何处理这一屡屡不断的致命威胁，清政府亦存在种种失策之处，作者对此作了个案分析。从黄冈起义来看，清政府缺乏预警机制，社会控制能力弱化，舆论氛围不利，又兼内部人事纠葛，资源内耗。就武昌起义这一事件而言，在处理发展与稳定二者关系的问题上，清政府急躁冒进，举措失当。又由于地方政府的懈怠、玩忽职守、防范不力，导致舆论失控，社会心理异化。起义爆发后，不论是湖北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均缺乏敏感，重视不够，应对迟缓。此外，清政府没有很好地借助外部资源，“不仅失去了立宪派的支持，还疏远了与列强的关系”。又由于官吏腐败无能，贪生怕死，更促使形势的恶化。对于民众运动，清政府的应对之策也往往难以如愿以偿，不仅不能平息事态，反而激化官民矛盾而导向严重的对立。如在拒俄运动中，清政府采取“压制而非疏导”的方针，“其直接后果是促动知识界背离政府，催化革命”。长沙抢米风潮是辛亥风暴的前奏，在这一事件中，更凸显了清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能力的欠缺。事前对突发事件缺乏预警机制，又未处理好与绅士的关系，“由于官绅斗法，造成米价高涨，最终酿成事变”。事变发生后，又推行高压政策，一意弹压，“直接助推了暴乱的形成”。事后，由于处理不当，官绅对立更为严重，守旧绅士和开化绅士，“竟然站在了一起共同对付清廷”。往



日的官绅合作,转为官绅对抗,成了清王朝迅速崩溃的一个因素。

诸如此类的剖析,揭示了武昌起义取得成功以及清王朝走向崩溃的某些重要原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王朝的迅速倒台,除了革命党人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之外,还与清政府本身的种种失误有关。诚然,从晚清历史的发展趋向来看,清王朝被新的政权所取代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敲响丧钟的时间却不无偶然性。历史的发展是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偶然性蕴涵着必然性,必然性又存在于偶然性之中。马克思说:“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①在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中,清政府处理危机的成败得失,无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包括清王朝处置舛谬在内的各种偶然因素,导致它在辛亥年爆发的革命中终结了自己的命数。对于这一起着重要作用的偶然因素,此前关注不够,该著从这一角度所做的探讨,无疑更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对清末这一历史转型时期的认识。毋庸讳言,该著还存在种种不足,诸如对清末社会危机的整体把握有所欠缺,对清政府应对策略的综合分析不够周全,某些论析甚或存在有失确切和不当之处等。但是,该著对清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举措及其结果做一全面的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探讨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思路,循着这一思路,可以在更广的范围,以更深的触角,探究和解析清政府走向毁灭的自身原因。这不仅拓展了历史探寻的空间,揭示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且对当今维护社会稳定,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李育民

^①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页。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新军失控与政府应对	(4)
第一节 新军失控	(4)
第二节 清政府对新军控制失败的原因	(8)
第三节 影响新军失控的非政府原因	(24)
第四节 袁世凯军队控制成功的逆向参照	(33)
第二章 革命派的武装起义与政府应对	(41)
第一节 武装革命风潮	(41)
第二节 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45)
第三节 从武昌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60)
第三章 报刊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	(82)
第一节 报刊舆论失控	(83)
第二节 报刊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	(89)
第三节 报刊舆论失控的非政府因素	(105)
第四章 民众运动与政府应对	(137)
第一节 民众运动风潮	(137)
第二节 从拒俄运动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140)
第三节 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	(170)
第五章 财政危机与政府应对	(195)
第一节 财政危机	(195)

第二节 清政府财政危机应对的失策	(206)
第六章 教化危机与政府应对	(232)
第一节 教化危机	(232)
第二节 清政府对教化危机应对的失当	(238)
结语	(249)
参考文献	(252)
后记	(275)



论

清末是我国历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转型时期,主要由于在该时段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得以终结,其间,社会动荡,危机重重;清末中央、地方政府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在今天颇多回味评析的价值。

学术界对于清末社会的研究,长期以来就予以了较多的关注,成果累累。据中国期刊网上的检索,以“清末”为题名的文章就有四千多篇(自1955年以来);以“清末”为关键词的文章竟达近万篇(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至于全文涉及“清末”的,其数量之多当可想象。不过,大量研究成就的背后,却潜藏着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就是研究的路径。人们受政治史范式的制约,往往习惯于自下而上,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努力寻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如四川保路运动,过去往往从保路者的角度来看待该事件,以至于落入指责清政府鱼民、媚外及张扬其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作用之俗套,难以自拔。其实,如若从上层看,如果从政府的角度看,引发该事件的政策因素是什么,处置失当的教训究竟是什么,等等,类似的问题将次第而生,这也体现了该课题研究的意义、价值。角度转换,别开洞天。站在下层的立场看上层,是基于认同革命的考虑;站在上层的立场看下层,则是为了社会稳定而去寻觅稳定社会的良药。史学研究应该具有资政的功能,治史者万不可逃避、漫忽自己的责任,当下社会同样需要司马光!

目前的学术界,已经由对革命神话般的歌颂转而为理性的思考,同时对于革命的对象——统治者的研究,也由一味批判而为冷静关注。就清末新政而言,从熟视无睹到正面探讨,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另一种可能:体制内的革命。毕竟,我们需要考虑社会资源和民众的承受能力,革命是有成本的;毕竟,变乱和动荡使得民众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得到的同时也付出了许多,我们同样需要探讨如何去避免这些非自然性的灾难。

总之,本书的研究价值,就理论方面而言在于研究的取径、切口,就实践层面而论在于资政、为现实服务。



本书就研究内容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军失控与政府应对。如新军失控、清政府对新军控制的失败原因、影响新军失控的非政府原因、袁世凯军队控制成功的逆向参照等。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与政府应对。如从丁未黄冈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从武昌起义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等。

第三,报刊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如清末报刊舆论失控、清末报刊舆论失控与政府应对、清末报刊舆论失控的非政府因素等。

第四,民众运动与政府应对。如从拒俄运动看清末爱国风潮缘何转而反清、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看清政府的危机应对等。

第五,财政危机与政府应对。如在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权之争中未能强干弱枝、清末政府财政投向新政的宣教不力、未能有效控制支出规模、盲目无序且操之过急等。

第六,教化危机与政府应对。如舆论氛围不良、相关机构自身建设需要强化、政策支持不合宜等。

本书的重点是,针对“清末社会危机与政府应对”这一问题,如何在梳理史料的过程中得出有现实价值、意义的结论?怎样将参与史学落到实处?毕竟,史学不能只面对过去,而背对现实,史学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现实之中的啊!

如何恰当地将制度学、政策学、经济学及管理学等相关理论融会贯通、恰如其分地运用到课题研究之中?这既是一个理论素养问题,也需要巧妙嵌入理论的技巧。

本书的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去除清王朝必然灭亡的认知前提,而对其所存在的问题予以理性分析,总结政策优劣得失,存亡教训,以为当今之资鉴。二是清末乃非理性时期,民众心理失衡,整个社会充满了激越的气息;铁路等新兴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不是慢了而是过快,清末政府改革亦是如此。三是民间资源利用不足乃清末政府的通病。

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有:

一是集中体现为嵌入社会网络理论,建构网络历史的框架,以利益集团为视点,评判政府的调控系统。这里面既包含新的理论尝试,又体现了研究者试图用多视角(力避选精法、集粹法的缺失)解读历史以叠架混合型历史系统的史观。要使我们所描绘的历史图景或结论与历史实态相吻合,理论交叉、链接及科技整合、整体史式的解读就显得尤为迫切。这里,我们需要排斥的是潜意识

里的理论认定及预设,并对理论的相对性有足够的警觉。

二是进行微观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展开小切口式的专题研究,努力营造宏观探讨平台的微观支撑;然后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具有规律性及现实指导意义的历史认知。总之,首先进行的是微观研究和局部研究,然后方上升到宏观和整体研究,即由低到高、循序渐进。

在研究中,我们力图借助实证和数理统计,从个案考察到宏观分析,从史料举证到逻辑思考,力求开阔视野,将局部和微观研究角度做巧,取证做细,将整体和宏观研究的着眼点做远,涉及面做博。



第一章

新军失控与政府应对

新军失控是清末很重要的问题,武昌起义就是由湖北新军一手缔造,北洋军也成了袁世凯要挟清政府的筹码。

在今天看来,清末社会危机之中,新军失控最为直接、致命,清王朝最终趋于灭亡,这方面的危机应对存在诸多问题。

目前学界对清末新军的研究,多取自下而上视角,自上而下探究者乏见,且一概归咎于积重难返,不可救药。这样的研究既显单一、片面,又似不负责任,缺乏价值、意义。

第一节 新军失控

最能显示清末新军失控的事例是武昌起义。清王朝最终灭亡,导火索是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之所以爆发,与湖北新军的集体哗变有关,清末新军的失控于此可知。

以湖北新军为例,到武昌起义爆发前,湖北新军一万五千多人中,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达五千余人,占了湖北新军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还有大批士兵是同情革命的,“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千余人”^①。这正如张难先所说:“革命党人意志冷静沉默,匿儒冠而讳新民,犹之西药以糖衣封其猛剂,食者甘之,而官厅遂毫不注意,士兵亦以彼辈可亲等于手足,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②清政府编练的湖北新军,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生力军。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②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34页。

湖北新军如此,其他亦类之。“陆军新学生皆饱吸新空气,多加入同盟会。”^①新军中许多军官曾留学国外,“知道中国要发愤图强,必先推倒清室,因而纷纷加入了同盟会”^②,“即未加入同盟会者,亦均同情革命”^③。新军“为革命潮流所激荡,咸思为民族争光荣,为国家求生存。虽因时代关系,对社会民众福利之观念未能深厚正确,而倾向共和之精神,则确为当时新军中级官以下所一贯同具”^④。到武昌起义时,革命党人对“新军之运动,已普及于云南、广西、三江、两湖,机局已算成熟”^⑤。一旦革命爆发,他们有可能“全都投向革命”^⑥。正如孙中山说道:“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也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人;若于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⑦

如果说武昌起义是清末新军失控的最终暴露的话,清末十年中颇能体现新军失控的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新军中的公开宣传。清政府编练新军,基本动力来自于控制军队,而结果却很失败,这可从清末革命宣传的公开性特征看出。资产阶级革命派致力于清末新军的策反,他们的宣传活动具有明显的公开性特征。

在湖北,革命党人设立秘密印刷所翻印革命书籍,因为通俗易懂而且可以歌唱在新军中影响很大。革命派还掌握《商务报》、《大江报》等报纸,以士兵利益的维护者身份出现,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以至声

①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第2编“军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281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86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一),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④ 柴德庚等:《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30—331页。

⑤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6页。

⑥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77页。

⑦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94页。



誉日起,销路日增^①。再加上湖北新军营中设有专门的“阅报室”^②,革命党人又在营内大量散发报纸,如《大江报》就在新军各标营设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平日免费赠送各营队“义务报”一份^③,所以报纸能够深入军营,直接到达新军士兵手中。结果,《大江报》“深受士兵们的欢迎”^④,其在军中之“权威殆无出其右者”^⑤,而受《汉口商务报》之熏陶者,“无不益自淬励”^⑥。

在南京第九镇,据何遂回忆:“部队里革命的气氛是较浓的。几乎所有的士兵都剪了辫子,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谁要不剪,就被骂作‘豚尾奴’。”^⑦

在广西,革命党人“革命宣传是多样化的,有时也是很大胆的。如何遂兼任干部学堂教官,常在课堂上阐说种族大义”。何曾经慷慨激昂地对大家演说,声称“我们要让满洲人统治下去,不久就当了亡国奴”,宣传“孙先生的党徒遍于天下,只要我们中间有人起来振臂一呼,就会天下响应”。^⑧据杜誉钦回忆,在广西陆军干部学堂里,“各级官长对学生的民族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灌输,也很注意。在战术作业和野外演习时,常以外国的军队为假想敌;在精神讲话中常讲到外交失败,旧军腐败无能,对外作战失败,国家有危亡之祸,勉励学生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等。当时进步的报刊,如《南风报》、《民报》、《梧州新报》等,在自修时间都有得看”。^⑨

在云南讲武堂,“当时的新书报,如《民报》、《天讨》、《国粹学报》、《汉声》、《汉帜》、《南风报》、《警世钟》、《猛回头》、《夏声》、《洞庭波》、《云南》,在学校中

① 王小娟:《湖北新军转向革命诸因素浅析》,《青海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第33—38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57,北平文华斋刊本,1928年。

③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V),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9页。

④ [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页。

⑤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⑥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V),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8页。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461页。

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03页。

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在广西》上集,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8页。

争相传阅……”^①据朱德回忆,当时云南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刘祖武、顾品珍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其他一些教官或者是同盟会员,或者是受到了同盟会革命宣传的影响。讲武堂的学生有五百多人,其中许多是不满于现状的青年。不久,就在讲武堂中建立起同盟会的组织,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大家经常讨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么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②李根源则利用他充任总办的便利条件,“常不避危险,灌输革命思想于诸生”。如1910年正月,李根源同教官李烈钧、顾品珍率学生到黑龙潭演习,之后,便带领他们参拜因反对清军入关而全家沉黑龙潭自尽的薛尔望的坟墓。回到讲武堂,即对学生说:“我们为什么参拜薛尔望先生墓呢?可惜他是一个文弱书生,不然,我们中国就不会像这样。”^③该学堂教官,也“经常利用精神讲话,在上课时间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他们以举例、暗示、影射的方式,启发引导学生,培养学生反清革命的思想感情。学生在校,受革命思想熏陶,思想趋向革命,毕业后,他们多数充任新军下级军官,又“向士兵进行宣传革命思想工作”。这样,“部队中的士兵就被革命党人所掌握,给辛亥重九光复打下了稳固的基础”^④。

广东革命党人,也“经常利用星期假日,邀约官兵去白云山附近地方集会,演讲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山东黄海之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两王入粤等惨痛史实”,其目的都在于揭发清廷腐败,辱师丧国,必须推倒。这样的演讲,效果极佳,“常常感动得新军们抱头痛哭”^⑤。

在东北,1909年在驻新民府的北洋新军第一混成协中成立了一个革命活动

①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3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第391页。

④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7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的组织,主要人物有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冯玉祥回忆说:“我们每天聚到一起,以读书为名,暗中即讨论些扩大人数运动军队等具体问题,或是报告各人所得的时事新闻,何处起革命运动,何时又有朝廷贵胄卖官盗爵的黑幕。”^①

在陕西,培养下级军官的速成学堂的学生,还组织了一个军人革命团体——“同袍社”,进行革命活动^②。

如此公开的内铄式革命宣传,即使抛开结果不论,单就这种状况的存在本身而言,对清政府来说,其对新军的失控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清末,从政府的角度看,新军失控固然有江河日下的客观外在原因,可如此公开化的宣传革命之现状,政府自身的举措方面一定有失当之处,当无疑问。

第二节 清政府对新军控制失败的原因

清政府对编练新军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特别是革命派的公开宣传,也并非熟视无睹。1906年,端方密奏称:“其设计最毒者,则专煽动军营中人,且以其党人投入军队,其第一策则欲鼓动兵变,其第二策则欲揭竿倡乱之时,官军反为彼用,否亦弃甲执冰不与为仇。”^③“自安徽新军炮队队官熊成基及巡警道徐锡麟等案发之后,清廷对于军警、学生,戒备加严,尤以军中为甚。”^④1910年1月广州新军起义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奏折中称:“综此次各兵所供投身会党,冀图乘间起事,并夺械戕官,昌言革命,几无异词。尤以黄洪昆一犯所供为最详尽,且亲笔书写,神色不变。并据供称新军为革命党出力,非为国家,其散布票纸有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四言句,且伪立天运年号。该党军制亦有统领标统各名目,其运动所至,以各省军界最多,利其器械多而操练熟……新军与逆党勾结,皖省酿变于前,今粤又煽乱于后,且主动者多由该军各级官长,一经获案,亦昌言不讳。其病根误听自由独立之学说,而外来之诱胁遂以乘之。腹心

① 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五),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

③ 柴德庚等:《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2页。

④ 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